

文化对灾害行为的影响:理论机制与政策启示*

孙磊 李宜纯**

[内容提要] 文化体系将灾害情境建构为日常生活中的预期风险,并为灾害为什么会发生、意味着什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造成威胁提供了解释框架,进而形塑了公众应对灾害的模式。本文提出文化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三种影响机制:意义给赋、认知启发和赋权增效,并据此讨论了灾害治理的文化路径。相关讨论从理论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公众灾害行为逻辑的认识,对于建立社会防灾减灾的长效机制,进而增强社会的整体韧性而言,亦具有一定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 灾害行为,文化,影响机制,防灾减灾,灾害治理

[Abstract] Cultural systems construct disaster scenarios as anticipated risks in everyday life and provide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for why disasters occur, what they signify, and the threats they pose. This framework, in turn, shapes the patterns of public response to disast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echanisms by which culture influences public disaster behavior: meaning assignment, cognitive heuristics, and empowerment enhancement. Based on these mechanis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pathways for disaster governance. The discussion enriches our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logic behind public disaster behavior and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establishing long-term mechanism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resilience of society.

[Key Words] Disaster Behavior, Culture, Influence Mechanism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Disaster Governance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震舆论场的区域差异及其风险沟通策略研究”(编号:72204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孙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李宜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灾害行为(disaster behavior)涉及人们面临灾害风险或身临灾害情景时广泛的响应行为,包括了人们对于灾害风险的认知和评估、灾害信息的获取与传播、灾害适应与恢复、灾害中的互动和彼此协作等。受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个体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众灾害行为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探究公众灾害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是很多灾害研究者的研究重点。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是理解灾害行为的重要方面。比如有调查研究指出,我国一些地方公众仍对“祛厄禳灾”仪式的减灾效用深信不疑且乐此不疲,显然这不符合“理性人”视角下的行为假设,但是如果将这种行为放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框架中,则变得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文化信仰体系中,灾害的发生意味着“神谴”,祭祀等仪式是与神对话的渠道,安抚了神灵自然就可以祛厄禳灾(叶宏,2012)。这正如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Hoffman)和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所阐述的那样——文化是理解人们以何种理由和方式应对灾害风险、为什么和如何遭受灾害的关键(Hoffman and Oliver-Smith, 2002)。很多研究都曾关注过风险或者灾害中的文化维度问题(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 Kahan et al., 2010; Kasperson et al., 1988;陶鹏、童星,2012),但大部分主要聚焦于风险或者灾害是如何被感知的(Tierney, 2014),这使得其他同等重要的研究议题缺乏系统讨论,公众灾害行为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就被包含其中。

探究“文化因素”与“灾害行为”的关系不仅具有理解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行为决策机制的理论意义,其政策启示价值亦值得关注。第一,“传统灾害应对方式”的流失被认为是文化层面灾害社会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McEntire, 2001)。例如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害中,很多外

来务工人员 and 游客没有识别出海啸正在迫近的信号,因而未采取防御措施,但是长期居住在泰国的莫肯部落(Moken)、印度尼西亚的锡默卢岛(Simeulue)以及安达曼-尼科巴群岛(Andaman-Nicobar Islands)的公众却能够在海啸来临前及时撤离逃生,避免严重伤亡,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们掌握当地辨识海啸征兆的传统知识(Mercer et al., 2012)。第二,文化因素影响了实践中灾害风险沟通与灾害教育等工作的效果。例如有关“信仰文化与公众灾害准备意识”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如何在一个宗教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进行灾害教育和风险沟通工作”提供启示(Sun et al., 2024)。第三,文化契合利于推动减灾项目的长效实施。倘若社区和基层的减灾项目能与当地的文化背景相契合,将会更加容易被公众接受,可以节约成本,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Dekens, 2007)。

二、灾害研究中的文化面向与文献回顾

如果以塞缪尔·普林斯(Samuel Prince)1920年关于哈利法克斯爆炸的研究论文《巨灾与社会变迁:基于哈利法克斯灾难的社会学研究》(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Up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alifax Disaster)^①作为开端,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Prince, 1920)。在这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部分学者就注意到了灾害常发社区“灾害文化”的生成(Moore, 1964; Anderson, 1965; Wenger and Weller, 1973)和“灾害成因”的宗教化认知(Dynes and Yutzy, 1965)现象,但是文化相关议题并没有引起灾害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加里·韦伯(Gary Webb)认为文化相关议题难以凸显的原因在于早期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结构功能主义、冲突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角的统摄,这些研究视角过于聚

^① 此论文是普林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参见 Samuel Henry Prince, "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Up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alifax Disaster",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20。

焦“社会结构”,使得灾害研究的议题选择出现了结构化偏误(structural bias);此外,由于美国早期很多灾害研究受军方资助开展,呈现了强烈的应用取向,文化相关议题因为理论性较强所以难以进入军方资助项目的研究范畴(Webb, 2007)。尽管如此,由于受到符号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思想的影响,少部分灾害研究学者也会强调符号、意义以及情境定义之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尽管“文化”并未成为早期灾害研究的主流议题,但是相关研究的火种也一直存续(Nigg, 1994)。

“文化”成为灾害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始于20世纪末。1996年人类学家安东尼·奥利弗-斯密斯发表了《致灾因子和灾害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一文,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灾害文化维度研究的重要历史转折点(Marsella A. J. and Christopher M. A., 2004)。此后,灾害文化研究逐渐涉及文化与灾害心理(Marsella A. J. and Christopher M. A., 2004)、公众灾害响应的文化差异(Blanchard-Boehm, 1997; Carter-Pokras et al., 2007)、灾害大众流行文化(Webb, 2007; Couch, 2000)、公众灾害行为中的文化影响(Liu and Sun, 2021; Solberg et al., 2010)等诸多方面。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东南亚游客与土著居民关于海啸应对的地方性知识差异使得国外很多灾害学者进一步重视文化因素之于防灾减灾的重要价值(Mercer et al., 2010; Mercer et al., 2012)。

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灾害研究。汶川地震后,从文化视角切入的灾害相关研究也逐步增多,只不过不同学者在“时间—空间—群体”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在时间维度上,一些学者着重从文化层域审视思考灾害历史或历史灾害,力图以史为鉴,为现代灾害防治事业提供经验(周琼,2021;王郅强、尉馨元,2014);在空间维度上,“灾区”成为众多灾害文化相关研究的场域(李永祥,2011;张曦,2023; Sun et al., 2019);在群体维度上,一些研究重点挖掘了少数民族群体在与灾害相伴适应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经验和文化遗产(徐艳波,2023)。有学者将相关研究概括为两种研究取

向(孙磊、苏桂武,2016):第一种研究致力于挖掘文化因素之于人们认知和响应灾害中的因果机制。基本的研究主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人类对其环境的适应所塑造的,文化继而指导了社会成员对该环境的适应和应对过程,包括人们如何适应和应对灾害(Rahmani et al., 2022)。“什么文化因素,有什么影响,如何影响”是该研究取向下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第二种研究取向则聚焦于挖掘和探究地方性知识体系中那些本土的、历史的、传统的、具有减灾意蕴的灾害应对经验和策略,认为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了一个群体对其世居生态环境的适应。这就意味着,作为一种集体生活方式或者包含了多种因素的复杂综合体,文化中会存在一个群体应对和适应灾害的“经验”或者“智慧”,只不过这些“经验”及“智慧”或者以一种“群体内所知,群体外不知”,或者以一种“群体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或者以一种“上一代知,下一代不知”的方式内嵌到群体内的生产生活当中。“这些‘经验’是什么”“如何积累”以及“有什么作用”是第二个研究取向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公众灾害行为中的文化影响机制

尽管“文化会影响公众的灾害行为”这一观点被很多学者所认同,但是其中的影响机制却缺乏严肃的讨论。本部分提出文化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三种主要影响机制:意义给赋、认知启发和赋权增效,如图1所示。按照欧玛尔·利萨尔多(Omar Lizardo)的文化类型学观点,文化分为公众文化(public culture)、可陈述的个体文化(declarative culture)和不可陈述的个体文化(non-declarative culture)三种类型(Lizardo Omar, 2017)^①,这实际上体现了文化的个体集体不同层次和

^① 关于三种文化类型的介绍参见胡安宁:《实质认同与图式关联:对文化作用机制的社会学分析》,《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

外显内隐不同表现形式。其中,“意义给赋机制”给予了公众明确的行为动机,这种动机和意愿是可以被描述和感知的(即可陈述文化),反映了一种分析式的决策模式。“认知启发机制”与公众的启发式决策模式相关,公众往往感知不到文化对其决策过程的影响(即不可陈述文化)。“赋权增效机制”从“权力”和“资源”的角度出发,强调集体层面“社会资本”和“集体记忆”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影响和塑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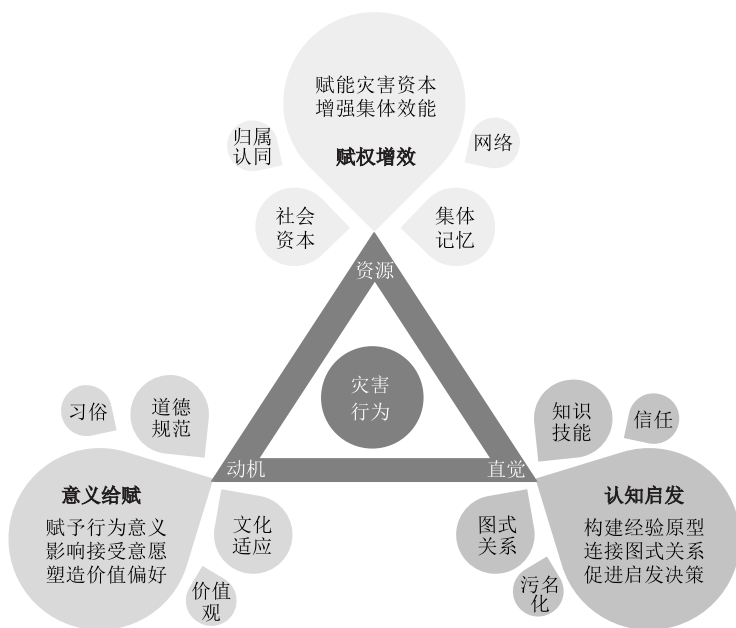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对公众应对灾害行为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 意义给赋

规范、价值观和信仰等文化要素可以看成群体共享的价值信念和符号体系,它为群体成员的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是群体互动的基础。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Stern et al., 1999)、规范—行为理论模型(norm-activities model, Schwartz, 1977)等理论观点为“文化—灾害行为”的意义给赋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一,文化系统会赋予某些行为特定的防灾减灾意义,进而转化为公众具体的防灾减灾行为动机。比如在一些地区,灾害神话(李永祥,2016)、灾害记忆(沈燕、王晓葵,2018)以及民间信仰(王建华,2018)等文化要素为公众提供了灾害的认知框架,如“灾害是超自然现象”,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某些仪式就具备了阻止灾害发生的价值。当然,这种意义给赋机制也可能给社区的防灾减灾工作带来负面后果。灾害深深地嵌入一个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之中,暗示着在其社会、经济以及改造过的环境中整个适应策略的状况(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等,2013),因此特定地区的某些文化要素也是在长期与灾害共存的过程中形成并建立起来的。故而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某些行为虽然没有在文化体系中明确给赋其防灾减灾价值,却在人地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最终成为特定地区减少破坏和降低脆弱性的手段。例如,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制定了保护自然的相关法规,有助于降低因环境恶化而导致自然灾害的风险(张涛,2022),再如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的穿斗式木结构房屋被认为具有较好的防震减灾效果(李永祥,2022)。

第二,社会规范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某些防灾减灾措施的接受意愿。道德规范与行为关系的建立在于个人如何定义行动情况(Schwartz,1977)。社会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等不同类型,前者指个体通过观察一种行为的社会普遍性来获取该行为的社会可接受程度,后者反映一个社会所赞扬和批判的行为(Cialdini and Trost,1998;Lapinski and Rimal,2005)。无论是描述性规范还是指令性规范,对公众灾害行为的规约作用背后,是因为规范给赋了特定行为以“符合社会期待和认同”的意义,使得公众可以以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方式应对灾害。但在某些情况下,规范对于特定行为的规约作用,也可能导致公众对政府防灾减灾倡议的低水平响应。例如,研究表明在孟加拉湾流行的女性“闭门不出文化(Purdah)——女性没有丈夫的允许不能随便离开家门”,使得当台风来临之时,女性前往避难场所的灾害应对行为受到了限制,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当地女性相较于其他群体在 1970 年和 1991 年台风灾害中的更大伤亡(Howell, 2003)。

第三,价值观塑造了灾害情境下公众对特定行为的偏好与倾向。例如,在灾害应对的过程中,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团结,重视制度并积极响应政府政策(Williams et al., 2015),而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更注重个人自由和权益,社会规范力量较弱,个体不太愿意接受政府对其行为的指导,无法和群体保持一致规范的态度与行为(Roos et al., 2015),正是集体中心倾向(allocentrism)与个体中心倾向(idiocentrism)的文化差异,赋予了不同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导致了实践中灾害应对模式的不同(叶浩生,2004)。有学者在罗马尼亚与马耳他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发现,马耳他公众不强调个人行动,而是将防灾工作融入社会关系和活动中,揭示了一种普遍的态度,即“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技能”。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研究参与者称自己更“谨慎”,行使“自我控制”,试图不阻碍或妨碍当局的努力,强调他们将“提供服务并服从指示”(Appleby-Arnold et al., 2018)。

(二) 认知启发

文化不仅可以以一种意义给赋机制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给公众提供了一种惯习式的自动认知或响应灾害方式,这种响应方式不依赖理性思考和逻辑判断,而表现为一种认知启发机制。“双过程理论”(Lizardo Omar, 2017; Marsella Anthony J. and Christopher Michael A., 2004; Simko and Olick, 2021)可对“文化—灾害行为”的认知启发机制提供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人类有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依赖于有意识的信息处理与分析,二是依赖于知识经验与直觉,文化的认知启发机制强调依赖于个体长期的、反复的关于灾害的经验和体会,从而形成某种近乎自动的反应和惯习式的判断(胡安宁,2022; Evans, 1984; Evans, 2006; Sloman, 1996; Gilovich et al., 2002)。认知启发机制涉及的文化要素大体可以分为“经验原型类”“图式关系类”与“启发促进类”三种类型。

第一,经验原型类主要包括知识(knowledge)、习惯(habits)、技能

(skill)等文化要素。根据文化意义的认知动机理论,经验原型类的文化主要表现为经验和物质模式的内化的过程(Bourdieu, 1990),通过发展和缓慢的学习过程,如习惯化和持续性记忆,来对灾害认知和行为决策过程产生影响(Smith and DeCoster, 2000; Lizardo Omar, 2017)。例如,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防灾减灾实践往往源于一种传统和长期积累的习惯,折射出自然灾害,特别是生物灾害的深刻影响以及朴素的原始生态观念(马军,2012)。此外,一些研究也指出,当地震灾害发生时,公众的避险逃生行为源于以前习得的逃生技能,采取躲避行为与个体的“第一反应”“有学习过地震知识”等有关,学习过地震知识,更能在危急时刻选择合适的避震方式(李华强等,2017)。

第二,图式关系类。文化信念和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包含了多种既定的相关关系,比如某些禁忌与灾害负面后果的联系。既有文献中,将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具有组织化、规律性和稳定性的概念属性连接称为“图式”(Schema)(胡安宁,2022; McIntosh, 1995)。例如,有学者认为宗教信仰体系可以看作是信众建立起来的关于上帝(或者信仰对象)本质、上帝意志或目的、上帝影响方式以及这些信仰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图式”(Neisser, 1976)。面对层出不穷的外界刺激,人们倾向于将新的知识融入既有的图式中,也即同化(assimilation),从而调整旧有图式以适应(accomodation)新的刺激,而基于既有图式的信息处理方式快于处理非图式信息(McIntosh, 1995)。这些“图式”作为公众重要的认知资源,会形成稳定的心理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或者是心智模型(mental model)。甚至有学者指出,人们只会注意到“他们已建立图式中的事物,而漠视其余的一切”(Neisser, 1976)。在相关灾害信息刺激下,一些作为“图式”资源的文化信念会得以启发,影响人们的灾害认知,从而左右公众的灾害行为。例如在污名化对于公众风险感知和行为的影响中,当特定的文化观念已经将某些事物与负面标记相连接(比如核技术与高辐射、某些禁忌行为与灾害负面后果),这些既有的“图式”关系将成为特定的启发式认知资源,影响了公众的灾害认知和相应的行为决策(Slovic et al., 1991)。

第三,启发促进类因素主要包括调节认知启发机制效果的因素,即何种情况下文化要素会通过“认知启发”机制作用于公众的灾害行为。首先,“信任”符合个体决策启发式系统发生的条件标准(Earle, 2010),具有降低社会复杂性的功能(Luhmann, 1979)。因此,在灾害经验、背景知识以及决策信息的条件下,信任成为影响行动发生的决定性因素(Siegrist, 2021)。例如,研究发现当公众缺乏对于某一事件的经验时,往往会基于专家或权威机构的信息作出响应行为(Siegrist et al., 2021)。此外,除了信任,时间压力、问题框架、任务情境、风险情境等因素也会影响文化认知启发机制对公众灾害行为的作用效果。已有研究表明,公众感知的风险水平越低,越容易依赖经验直觉进行快速决策,促进文化认知启发式作用机制效果的发挥(黄敏学、王薇, 2019; Wong et al., 2021)。

(三) 赋权增效

“权力”(power)可以在不同维度得以体现,例如掌握影响决策结果的资源、控制决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塑造规范使得“行为”合法化等(Appelbaum et al., 1999)。人们在复杂的人地关系中,需要不断争取对灾害的控制“权力”,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文化体系本身含有诸多灾害应对的资源,如基于特定价值观、信仰和信任所形成的“认知社会资本”和“结构社会资本”以及适应灾害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等灾害文化。这些文化意义上的资源并非为特定的个体所独有,而是为同一文化群体内成员所共享,提高了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的灾害韧性和集体效能,因此,这类文化因素与公众灾害行为之间存在“赋权增效”的关系。

认知社会资本(如社区归属感、信任等)和结构社会资本(互动机制、关系网络等)可通过赋权增效机制对集体应对灾害行为产生影响。当面临共同的灾害风险时,与灾害应对相关的诸多活动会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开展,群体内的所有成员自觉地加入集体行动,而非因身份、地位等差异被隔离在集体决策之外。既有研究亦指出,强大的社会联系和凝聚力(Social bonds and cohesion)能够促进社区信息和资源的共

享,对社区韧性的提升有积极影响,有助于受灾社区更快地从灾害中恢复(Joshi and Aoki, 2014a; Paton, 2003; Appleby-Arnold Sandra et al., 2021)。例如,研究发现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可以激活社区的互助机制、灾害应对集体协作机制以增强社区灾害集体应对能力(Mori et al., 2019; Appleby-Arnold S. et al., 2021)。

文化因素中的地方性知识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等相关资源同样也会通过一种赋权增效机制形塑公众的灾害行为(方修琦, 2021;游红霞、王晓葵,2015;李永祥,2022)。例如,一些人类学研究所揭示的我国西南灾害多发地区中有关生态、环境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促进了当地居民对灾害环境的适应(李永祥,2011b)等就是该机制的具体体现。

四、灾害治理文化路径

提高社会公众的灾害应对能力是对以“科层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政府灾害管理模式的有益拓展。然而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防灾减灾政策和措施往往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政策效果(Roshan et al., 2016; Entwistle, 2021; Toan Luu Duc, 2020)。探寻灾害治理的文化路径应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灾害治理格局的重要方面,如图 2 所示。

(一) 以文化助推行为改变

近年来随着行为公共管理相关研究的兴起,在理解公众“认知—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通过非强制的引导措施使公众行为发生微妙变化的作用效果已被很多研究检验和证实(张书维、李纾,2018;吕孝礼等,2020)。然而,对文化变量的忽视,可能使现实措施难以实现对公众行为的预期引导效果(Entwistle, 2021)。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以“文化”助推公众行为的改变,有可能进一步释放社会的灾害应对潜能,减少灾害治理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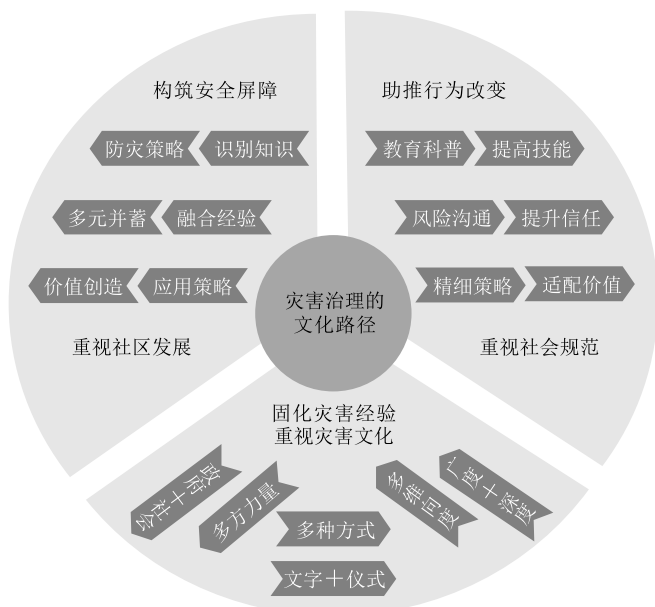


图 2 灾害治理的文化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公众灾害素养可视为一种“经验原型类”的灾害文化,其包含的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帮助他们实现“即时响应”。因此,第一,强化灾害教育与科普,提高公众对于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可以作为提高公众灾害素养、以文化助推公众行为改变的起点。第二,优化风险沟通措施,提高公共部门信任。研究发现,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时间压力的灾害情境下,公众往往基于对于权威主体,特别是公共部门的信任作出灾害响应(Siegrist, 2021; Siegrist et al., 2021),因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基于过去政府工作的绩效而形成的一种评价,是影响公众遵从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优化沟通措施,提高灾害管理部门的表现,有助于政府与公众形成良好稳定的信任关系。第三,立足文化特征,设计精细化的策略。价值观影响公众对于特定行为的偏好与倾向,这使得实践中灾害应对模式应当充分考虑公众的文化差异,进行精细化策略设计。例如,研究发现某些社区的公众会将灾害响应

融入既有社会关系中,因此在灾害发生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家人和朋友获得帮助,而另一些强调个人行动地区的公众则会依赖政府的紧急服务(Appleby-Arnold S. et al., 2021)。因此,对于实务部门来说,在集体文化和社区凝聚力较强的社区中,强调个人与家庭责任对于集体应对灾害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更能促使公众采取积极主动的响应行为;而在个人文化和人际关系较为松散的社区中,需要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与指南,强调个人灾害应对责任。

此外,以文化助推行为的改变,需要重视社会规范的功能。对灾害管理部门来说,认识不同社会规范的影响机制,采取有效的政策引导措施对于提升灾害响应效果尤为关键。在灾害响应过程中,政府通过使用恰当的风险沟通措施主动向公众提供应对方法和指南,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适应和应对危机,提供公众行为的积极规范,从而引导公众积极的响应行为。

(二) 以文化构筑安全屏障

文化具有凝聚共识、精神激励与规范指引等功能,尤其是在灾害发生前和发生时,灾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挖掘和培育灾害文化的方式,构筑社会基层防灾减灾的文化屏障。不同地域文化中蕴含着当地公众有效利用和保护其所处自然生境的生态智慧和生存技能。作为一种知识策略和实践性的灾害文化,地方性知识是公众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习得、积累和传承的地方文化相关知识体系。有效识别、继承和发扬地方性知识中的灾害价值,不仅有助于实现灾害减缓与准备,提升社区韧性,也有利于提高社区防灾减灾项目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Dekens, 2007; Kelman et al., 2012)。“识别—融合—应用”是继承和发扬传统灾害应对知识和策略的重要环节。“识别”意味着要梳理地方性知识或经验中于防灾减灾有益的内容,因地制宜地加以甄别和利用。“融合”强调充分利用地域社会本土的、传统的灾害适应/应对经验及策略,并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和科学技术相结合(Mercer et al., 2010; UN-ISDR, 2005; Pelling, 2007; Innocenti et al., 2011; Le Dé et al., 2015)。最后,要实现知识策略的“应用”。对灾害管理部门来说,这些

知识策略不仅可以作为制定防灾减灾规划与应急预案的依据,同时也可以形成当地灾害科普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公众对防灾备灾、救灾减灾的认知。

现代化的风险是一个复杂系统,具备了新的形式与特征,需要来自兼具功能、价值与情感灾害治理共同体的综合应对(文军,2020)。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基于个人或者集体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一种资源,在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中发挥作用(赵延东,2007;张文宏,2003)。研究表明,以信任、互惠、协作和凝聚力等要素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有助于促进资源共享与合作行为,对灾害韧性的提升尤为关键(Joshi and Aoki, 2014b; Appleby-Arnold S. et al., 2021)。因此,在以文化要素构筑社会灾害风险防范与应对的安全屏障路径下,要将社区发展与社区安全相结合(Appleby-Arnold S. et al., 2021),通过内外部组织动员与激励,发展信任关系与社区参与制度,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与公众个体及家庭的利益联结、价值共享与情感整合,构筑强韧关系纽带,培育社会资本。此外,灾害管理部门在引导社会多元主体“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灾害治理过程中,除了需要注重培育和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本,还需要与社会组织建立“补充与互补”并重的合作治理模式,提升社会组织应急服务的多样性与有效性,并通过制度吸纳、契约合作等形式激励和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相关的减灾项目,利用社会组织资源体系达成风险消减目标(陶鹏、薛澜,2013)。例如有研究指出,宗教信仰和相关的仪式、习俗和习惯可以培养群体认同感,维持基于信仰的社会网络,提高公众灾害应对的集体效能(Sun and Qi, 2023)。因此,在宗教信仰地区,利用这些宗教组织的资源体系,发挥其在基本生活资源、资源运输与分配协调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完善相关宗教组织筹资、捐助以及行动等方面的规制措施,可有序引导宗教组织参与灾后应急响应与救助。此外,灾害管理部门也可以与宗教组织合作,借助宗教组织在特定地域的影响力,利用信仰的力量引导公众的灾害合作行为,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灾害带来的冲击。

(三) 以文化固化灾害经验

文化转变与文化适应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条件,社会学习是灾害文化功能实现的重要路径(陶鹏、童星,2013),灾后是社会学习的最好时机。因此,要加强对灾害应对的有效学习,参与学习的既包括灾害管理部门也包括每一位社会公众。对于灾害管理部门来说,重要的是深入分析灾害成因和救援行动中的不足之处,进而改进制度设计和价值导向,以此积累宝贵的经验,为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奠定基础。对社会公众来说,要通过反思灾害折射的脆弱性,主动承担起防灾减灾的责任,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在文化视角下,构筑“灾害记忆”便是灾后社会学习的重要路径和方式。

灾害会被社会所记忆,通过意象的复现影响个体生活,而一旦汇聚为“集体记忆”,就会影响集体决策、行为乃至文化的变迁(樱井龙彦,2008)。大量研究表明,大型灾害发生后,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往往会通过重构灾害记忆的方式,来消解灾害带来的创伤(雷天来,2019)。一个地域灾害记忆的建构和意义化过程,既是一种针对灾害的应对方式,也是这个社会基本文化逻辑的体现(王晓葵,2016)。因此,灾害文化记忆的构筑是灾害恢复和灾害经验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帮助公众更好理解灾害、提升社会灾害意识与社会韧性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实现社会团结互助、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等政治作用。因此,需要使用多种手段来实现灾害记忆的文化塑造,促进文化层面灾害经验的固化。

第一,需要结合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多方力量,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记忆构建路径相融合。集体记忆的建构绝不是单维的,也不是某一种力量促成的,而是综合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力量(徐开彬、徐仁翠,2018),需要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第二,需要综合多种灾害记忆传承方式和载体。灾害记忆存在“与文字相关的”和“与仪式相关的”两种传承方式(沈燕、王晓葵,2018;王霄冰,2007)。当大型灾害发生后,我国政府往往会主导纪念碑和纪念馆等灾害记忆设施的建设,这些空间场所起到了保留灾害记忆的作用。同时,文学作品、大众媒体也都是构建灾害记忆的中介和载体,丰富这些灾害记忆的

载体能够强化灾害记忆,对于社会灾害素养、社会互助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需要扩展灾害记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灾害纪念碑、灾害博物馆、灾害传说、祛厄攘灾仪式等都是“记录”灾害记忆的具体表现(樱井龙彦,2008;沈燕、王晓葵,2018;王晓葵,2013),充分利用这些方式能够丰富灾害记忆的表现形式与提升内容的丰富度。同时,更要及时通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互联网数据爬取等方式收集灾区的灾害应对资料,构建相应资料库,不仅要记录灾害事件本身,更要涉及灾难故事、公众情感的传承,提升内容的深度,促进社会灾害经验的及时固化。

参考文献

[美]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彭文斌、黄春、文军:《“何为灾难?”:人类学对一个持久问题的观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2期。

方修琦:《灾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

胡安宁:《实质认同与图式关联:对文化作用机制的社会学分析》,《学术月刊》2022年第11期。

黄敏学、王薇:《移动购物更快吗?决策场景与思维模式的相容性》,《心理学报》2019年第5期。

雷天来:《灾害文化记忆的建构:路径、逻辑及社会效应——以海原大地震为例》,《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地震灾时个体行为反应模式与影响因素——以芦山地震为例》,《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李永祥:《关于泥石流灾害的人类学研究——以云南省哀牢山泥石流为个案》,《民族研究》2008年第5期。

李永祥:《傣族社区和文化对泥石流灾害的回应——云南新平曼糯村的研究案例》,《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

李永祥:《泥石流灾害的传统知识及其文化象征意义》,《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李永祥:《灾害场景的解释逻辑、神话与文化记忆》,《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李永祥:《灾害文化与文化防灾的互动逻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吕孝礼、高娜、朱宪:《行为洞见与公共管理实践:国际进展与启示》,《行政管理》2020年第8期。

马军:《瑶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知识与减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沈燕、王晓葵:《灾害记忆何以传承——以一个村落地方神的变迁史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孙磊、苏桂武:《自然灾害中的文化维度研究综述》,《地球科学进展》2016年第9期。

陶鹏、童星:《灾害社会脆弱性的文化维度探析》,《学术论坛》2012年第12期。

陶鹏、童星:《灾害链、危机政治与灾害管理制度变迁》,《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陶鹏、薛澜:《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急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王建华:《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区域化分异——以晋东南地区成汤信仰和三峻信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期。

王霄冰:《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王晓葵:《灾害文化的中日比较——以地震灾害记忆空间构建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王晓葵:《“灾后重建”过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以灾害记忆为中心》,《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

王郅强、尉馨元:《古代国家仪式在传统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以祭祀为研究对象》,《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徐开彬、徐仁翠:《汶川十年:汶川地震的媒介记忆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6期。

徐艳波:《灾害文化视野下拉祜族节日建构研究——以云南南美拉祜族乡

搭桥节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23年第3期。

叶浩生:《文化模式及其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2004年第5期。

叶宏:《地方性知识与民族地区的防灾减灾——人类学语境中的凉山彝族灾害文化和当代实践》,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页。

[日]櫻井龙彦、虞萍、赵彦民:《灾害的民俗表象——从“记忆”到“记录”再到“表现”》,《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

游红霞、王晓葵:《灾害叙事与民俗应对路径研究——以旱灾为中心的考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5期。

张书维、李纾:《行为公共管理学探新:内容、方法与趋势》,《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1期。

张涛:《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理论学刊》2022年第5期。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张曦:《死生之间:灾害与仪礼——以5·12汶川大地震灾后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赵延东:《社会资本与灾后恢复——一项自然灾害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周琼:《灾害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史学集刊》2021年第2期。

Anderson William A, “Some Observations on a Disaster Subculture: The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of Cincinnati, Ohio, to the 1964 Flood”,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Research Note #6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65, pp.1—25.

Appelbaum Steven H., Hébert Danielle, and Leroux Sylvie, “Empowerment: Power, Culture and Leadership—a Strategy or Fad for the Millennium?”,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1999, 11(7), pp.233—254.

Appleby-Arnold S., Brockdorff N., Jakovljević I., and Zdravković S.,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Cultural Fac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Romania and Malta”, *Disasters*, 2021, 45(3), pp.664—690.

Appleby-Arnold Sandra, Brockdorff Noellie, and Callus Celia, “Develo-

ping a ‘Culture of Disaster Preparedness’: The Citizens’ 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21, 56, pp.102—133.

Appleby-Arnold Sandra, Brockdorff Noellie, Jakovljevic Ivana, and Zdravković Sunčica, “Applying Cultural Values to Encourage Disaster Preparedness: Lessons from a Low-Hazard Count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8, 31, pp.37—44.

Blanchard-Boehm Denise, *Risk Communica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 Ethnic and Gender Response to 1995 Revised, Upgraded Earthquake Probabilities*, 1997.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arter-Pokras Olivia, Zambrana Ruth E, Mora Sonia E, and Aaby Katherine A, “Emergency Preparedness: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s of Latin American Immigrants”, *Journal of Health Care for the Poor and Underserved*, 2007, 18(2), pp.465—481.

Cialdini Robert B., and Trost Melanie R.,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Norms, Conformity and Compliance”,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s.1—2, 4th Ed., McGraw-Hill, 1998.

Couch Stephen R, “The Cultural Scene of Disasters: Conceptualizing the Field of Disasters and Popular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0, 18(1), pp.21—37.

Dekens Julie, *Local Knowledge for Disaster Preparedness: A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ICIMOD), 2007.

Douglas Mary Tew, and Wildavsky Aaron B., *Risk and Culture: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Dynes R. R., and Yutzy D, “The 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of Disaster”, *Topic 10: A Journal of the Liberal Arts*, 1965, pp.34—48.

Earle Timothy C., “Trust in Risk Management: A Model-Base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Risk Anal.*, 2010, 30(4), p.541.

Entwistle T., “Why Nudge Sometimes Fails: Fat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Behaviour Change”, *Policy and Politics*, 2021, 49(1), pp.87—103.

Evans Jonathan St B. T., “Heuristic and Analytic Processes in Reasoning”,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4, 75(4), pp.451—468.

Evans Jonathan St B. T., “The Heuristic-Analytic Theory of Reasoning: Extension and Evaluation”, *Psychon Bull Rev*, 2006, 13(3), pp.378—395.

Gilovich Thomas, Griffin Dale, and Kahneman Daniel, *Heuristics and Biases: The Psychology of Intuitive Judgment*, 1 ed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offman Susanna, and Oliver-Smith Anthony. “Catastrophe and Culture: The Anthropology of Disaster.” Santa Fé: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2.

Howell Philippa, *Indigenous Early Warning Indicators of Cyclones: Potential Application in Coastal Bangladesh*, Benfield Greig Hazard Research Centre, 2003.

Innocenti Demetrio, Albrito Paola, and Policy, “Reducing the Risks Posed by Natural Hazards and Climate Change: The Need for a Participatory Dialogue betwee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Policy Makers”,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11, 14(7), pp.730—733.

Joshi Abhay, and Aoki Misa,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Policy in Disaster Recovery: A Case Study of Tamil Nadu State, In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4a, 7, pp.100—108.

Joshi Abhay, and Aoki Misa,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Policy in Disaster Recovery: A Case Study of Tamil Nadu State, India”, *INT J DISAST RISK RE*, 2014b, 7, pp.100—108.

Kahan Dan M, Jenkinssmith Hank C, and Braman Donald, “Cultural Cognition of Scientific Consensu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10, 14(2), pp.147—174.

Kasperson Roger E, Renn Ortwin, Slovic Paul, Brown Halina S, Emel

Jacque, Goble Robert, Kasperson Jeanne X, and Ratick Samue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1988, 8(2), pp.177—187.

Kelman Ilan, Mercer Jessica, and Gaillard JC,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eography*, 2012, 97(1), pp.12—21.

Lapinski Maria Knight, and Rimal Rajiv N, “An Explication of Social Norms”,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5, 15(2), pp.127—147.

Le Dé Loïc, Gaillard Jean-Christophe, and Friesen Ward, “Academics Doing Participatory Disaster Research: How Participatory Is It?”,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15, 14(1), pp.1—15.

Liu Xingyu, and Sun Lei,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Fatalism Belief and Optimism Orientation on Seismic Preparedness: Considering Their Roles in the Nexus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Preparedness”,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21, pp.1—15.

Lizardo Omar, “Improving Cultural Analysis: Considering Personal Culture in Its Declarative and Nondeclarative Modes”, *AM SOCIOLOGICAL REV*, 2017, 82(1), pp.88—115.

Lizardo Omar “Improving Cultural Analysis: Considering Personal Culture in Its Declarative and Nondeclarative Mo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 82(1), pp.88—115.

Luhmann Niklas, *Trust and Power: Two Works*, John Wiley and Sons, 1979.

Marsella A. J., and Christopher M. A., “Ethn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Disaster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ssues, and Direction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4, 27(3), pp.521—539.

Marsella Anthony J., and Christopher Michael A., “Ethn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Disaster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ssues, and Direction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004, 27(3).

McEntire David A, “Triggering Agents, Vulnerabilities and Disaster Reduction: Towards a Holistic Paradigm”,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

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1, 10(3), pp.189—196.

McIntosh Daniel N., “Religion-as-Schema,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Coping”,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995, 5(1), pp.1—16.

Mercer Jessica, Gaillard J. C., Crowley Katherine, Shannon Rachel, Alexander Bob, Day Simon, and Becker Julia, “Culture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Lesson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12, 11(2), pp.74—95.

Mercer Jessica, Kelman Ilan, Taranis Lorin, and Suchet-Pearson Sandie,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Indigenou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isasters*, 2010, 34(1), pp.214—239.

Moore Harry E, *And the Winds Blew*, University of Texas, 1964.

Mori Marta, McDermott Ronan, Sagala Saut, and Wulandari Yasmina, “Sinabung Volcano: How Culture Shapes Community Resilienc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2019, 28(3), pp.290—303.

Neisser U., *Cognition and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Freeman, 1976.

Nigg J.M., “Influences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on Disaster Research”, in Gerald M. Platt and Chad Gordon, eds., *Self,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ety: Essays Hono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Ralph H. Turner*, JAI Press, 1994.

Oliver-Smith Anthon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on Hazards and Disaster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6, 25, pp.303—328.

Paton Douglas, “Disaster Preparedness: A Social-Cognitive Perspective”, *Disaster Prevention &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12(3), pp.210—216.

Pelling M., “Learning from Others: The Scope and Challenges for Participatory Disaster Risk Assessment”, *Disasters*, 2007, 31(4), pp.373—385.

Prince Samuel Henry, “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 Based Up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Halifax Disaster”, *London P. s. king & Son Ltd*,

1920.

Rahmani M., Muzwagi A., and Pumariega A. J., “Cultural Factors in Disaster Response among Diverse Children and Youth around the World”, *Curr Psychiatry Rep*, 2022, 24(10), pp.481—491.

Roos Patrick, Gelfand Michele, Nau Dana, and Lun Janetta, “Societal Threat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Strength of Social Norms: An Evolutionary Basi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5, 129, pp.14—23.

Roshan Mina, Warren Matthew, and Carr Rodney,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by Organisations for Crisis Communica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3, pp.350—361.

Schwartz S. H., “Normative Influence on Altruism”,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77, 10, pp.222—275.

Siegrist Michael, “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isk Analysis*, 2021, 41(3), pp.480—490.

Siegrist Michael, Luchsinger Larissa, and Bearth Angela, “The Impact of 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on the Acceptance of Measures to Reduce Covid-19 Cases”, *Risk Anal*, 2021, 41(5), pp.787—800.

Simko Christina, and Olick Jeffrey K.,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Culture: A Multi-Facet Approach”, *Am J Cult Sociol*, 2021, 9(4), pp.431—459.

Slooman Steven A., “The Empirical Case for Two Systems of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6, 119(1), pp.3—22.

Slovic P., Layman M., Kraus N., Flynn J., Chalmers J., and Gesell G., “Perceived Risk, Stigma, and Potential Economic Impacts of a High-Level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in Nevada”, *Risk Analysis*, 1991, 11(4), pp.683—696.

Smith Eliot R., and DeCoster Jamie, “Dual-Process Models in Social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Links to Underlying Memory Syste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0, 4(2), pp.108—

131.

Solberg C., Rossetto T., and Joffe 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eismic Hazard Adjustment: Re-Evaluating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 2010, 10(8), pp.1663—1677.

Stern P., Dietz Thomas, Abel Troy D., Guagnano G., and Kalof L., “A Value-Belief-Norm Theory of Support for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Environmentalism”, *Human Ecology Review*, 1999, 6, pp.81—97.

Sun Lei, Guo Jun, and Qi Wenhua, “Earthquake Attribution, Risk Perception, and Self-Efficacy: Tibetan Buddhism Believers’ Preparedness Motivation”, *Environmental Hazards*, 2024, pp.1—20.

Sun Lei, and Qi Wenhua, “Tibetan Buddhist Belief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Yushu Area, China”, *Disasters*, 2023, 47(3), pp.788—805.

Sun Lei, Su Guiwu, Tian Qing, Qi Wenhua, Liu Fenggui, Qi Min, and Li Ruoyu, “Religious Belief and Tibetans’ Response to Earthquake Disaster: A Case Study of the 2010 Ms 7.1 Yushu Earthquake, Qinghai Province, China”, *Natural Hazards*, 2019, 99, pp.141—159.

Tierney Kathleen J,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Risk”, *The Social Roots of Risk*,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Toan Luu Duc Huynh, “Does Culture Matter Social Distancing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Safety Science*, 2020, 130.

UN-ISDR. “Hyogo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5—2015.” In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Kobe, Hyogo Japan, 2005.

Webb Gary R, “The Popular Culture of Disaster: Exploring a New Dimension of Disaster Research”, *Handbook of Disaster Research*, Springer, 2007.

Wenger Dennis E, and Weller Jack M, “Disaster Subcultures: The Cultural Residues of Community Disasters”,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Preliminary Paper #9*. Disaster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Delaware, 1973, pp.1—17.

Williams Lynn, Rasmussen Susan, Kleczkowski Adam, Maharaj Savi,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九辑

and Cairns Nicole,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and Social Distancing Behaviour in Response to a Simulated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c”, *PSYCHOL HEALTH MED*, 2015, 20(7), pp.832—837.

Wong Jody Chin Sing, Yang Janet Zheng, Liu Zhuling, Lee David, and Yue Zhiying, “Fast and Frug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Related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Risk Anal*, 2021, 41(5), pp.771—786.